



采访本

■ 安徽合肥 冯长福

汪老师家住合肥匡河南岸一小区，四室两厅的房子宽敞又整洁。阳台、客厅和餐厅里，有序摆放着多种花卉与绿植，有的在花架上，有的在窗台上，有的在书桌旁，有好几盆花开得正艳。虽是隆冬时节，室内却春意盎然。今年81岁高龄的汪老师，虽患有心脏病等疾病，常年服药，但精神状态不错。看我不停地赞赏他家的花，汪老师领我到阳台改成的书房里，坐下后第一件事，就忙着打开电脑里的家庭养花相册，让我看图“饱览”。相册里一花一文，对每种花的名字、习性、特点及其生长过程中令人惊喜的点滴变化，均有记录。

阳台改成的书房，因面积不大，只有一桌一椅、两个书柜。书柜里摆放的主要是汪老师手边常用的书刊资料，其中农村改革方面的图书资料占了一个书柜。另一个书柜里有两三层整齐地或“立”或“躺”着他多年记者生涯中用过的采访本。1978至1982年的数十本采访本，每一本里都夹了些小纸条。汪老师说，根据这些采访本，他写了一本书，2021年10月该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定名为《见证——艰辛的第一步》。这部27万字的书稿是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反复翻阅20多个采访本和大量原始资料，精心撰写的一部农村改革回忆录。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为据，回望安徽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风雨历程，全面展示了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艰难曲折，同时表现了万里等领导人 and 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勇于担当、改革创新的为民情怀和奉献精神。

很多记者不注意保存自己的采访本，其实有些内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采访本，也是一座“富矿”。汪老师还利用当年采访本上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



一些文章对历史的“误读”。曾有一部涉及安徽农村改革的人物传记，他阅后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有的是常识性错误，有的属于作者未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凭想象”下笔所致。为此，他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对该传记里的错误之处，逐一进行辨析与纠正。该书作者读了这篇文章后，不仅诚恳接受了汪老师的“指谬”，而且由衷敬佩汪老师的严谨学风。“名人传记，写法上可以浪漫多姿，但忠于史实，是最基本的要求。”汪老师说。

谈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汪老师说，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平时要加强学习，注重资料积累。他从1982年起，直至退休，一直坚持订阅《新华文摘》《求是》《经济研究》《新闻战线》等刊物。业余时间还自学了马列经典著作、西方经济学等。采访本和采访中接触到的重要文件、材料，他全都妥善保存。二是把握“三头”，即上头、下头、外头。“上头”就是上面的精神，“下头”就是基层的实情，“外头”就是省外甚至国外的相关情况。把握“三头”，才有不一样的发现新闻的眼光，看问题才能比别人深一层，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稿子。三是写法上要力求创新，要敢于打破常规，不拘泥老套。“记者优秀不优秀，要靠作品说话。”汪老师说，记者有过硬的作品才会受人尊敬。虽然当了多年安徽日报经济部主任，但他没有停留于“策划、协调、指挥”层面，而是挤出时间外出采访，写了很多有分量的稿子，对部里同志也起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汪老师大名汪言海。他被誉为“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人”。

我的大学

■ 安徽宣城 杜爱鹏

我的家乡安徽宣城市，曾经有一所大学，全称为“安徽劳动大学”。这所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早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徽劳动大学位于宣城县城东郊一个名叫叶家湾的地方，原来是国营宣（宣城）郎（郎溪）广（广德）农场的一个作业区。此地在此航公路干线上，距离县城有十八公里。巧得很，叶家湾往东四公里就是我的家乡洪林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然而自从与大学为邻后，似乎也沾上了很多文气和运气。家乡人都把大学当做是家门口的大学，习惯性地称之为“劳大”或“大学”。

那时候，经常有“劳大”的干部、老师、学生到我们洪林公社搞工作队，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等。生活在小集镇上的我对他们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感到很新奇，感觉与自己的父辈们不一样，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大上”。也常常能见到来洪林桥买菜的大学食堂的采购员。每天清晨一男一女两人骑着自行车，雷打不动地来到洪林桥街西头的菜市场。洪林桥不仅给家门口的大学提供菜蔬，发挥“菜篮子基地”的作用，还提供建筑用的河沙。一辆辆“东风”牌卡车来洪林桥装载河沙，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最能拉近我们这些周边顽童与劳大距离的，也是最让我们感到家门口大学可亲可敬的地方，莫过于看电影。在那个文化贫瘠、文娱活动极度缺乏的年代，到劳大看电影对于我们这些对文化需求几乎是嗷嗷待哺状态中的中小小学生来说，不亚于如今参加一场大型综艺晚会，那就是一顿文化大餐啦！那时节，只要听说“今晚劳大有电影”，就会欢愉兴奋不已，都会激动一整天，上课都没有心思听，盼着早点放学，盘算着放学后的“活动方案”。因为大家都明白，劳大放的电影都比较新。坊间传说，那是从省会合肥直接派送过来的片子，越过芜湖和宣城。事实也证明，县城电影院放过的影片几乎都是迟于劳大。所以劳大放电

影，不仅吸引了洪林桥的观众，也同样吸引到周边孙埠、建国、丁店、棋盘等几个公社的群众。

下午放学后，同学几个相邀着去看电影，晚饭吃不吃都无所谓了。去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干脆甩腿走过去，八里路不算啥；一个是采取快捷方式，那就是搭顺风车，到沙河滩去等拖沙的“东风”卡车。沙河滩的沙堆边，东风卡车停在那里，黄灿灿的河沙在搬运工人铁锹挥舞中，飞进车厢。一边站着蹭车少年，就像是在车站候车一样。遇到好说话的司机，允许你坐在车厢沙堆上，叮嘱你自己小心就是；遇到不好说话的不愿带你的，只好采取强行爬车了。堆场的进出口有一个小坡，坡虽然不太陡，但土质松软，汽车负重爬坡时车速很慢。乘东风车龇牙咧嘴哼哼唧唧爬坡时，迅速抓住车厢后门边缘，脚踩一个横档，一纵身就上去了，有点像铁道游击队“飞虎队”爬火车的架势。坐在松松软软的河沙上，随着卡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缓缓前进，身体随着卡车轻微地摇晃着，感觉真的很好！当然那些胆子小、身手不灵巧的只得罢手，只好选择走路吧。晚上电影散场后，大家便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地往东走，像是野营拉练的军队，绵延几千米。大家边走边回味电影里的精彩片段，交流着观后感，模仿着故事片中人物的台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劳大”改名为“皖南农学院”，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转变成专门学院，随着中文系、数理系、政治系的划转、大批的教师调离，感觉到大学的规模似乎在缩小，但我们还是习惯叫它“劳大”。现如今安徽劳动大学、皖南农学院，都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昔日的老师都已奔赴各地各高校，大多都已退休；承载过一所大学的叶家湾又恢复成早先的农垦基地，教职工宿舍也变成了农民新村，留存的图书馆、教学楼也另作他用，大学的气息荡然无存，只能从残存印记中窥见昔日的辉煌，留给人们以无限的遐思和感叹。

从踏地菘到黄心乌

■ 安徽合肥 程耀恺

入冬后雨雪霏霏，长江以北的菜地、菜园里的蔬菜，琼枝玉叶，顿成枯槁。以往节令一到，北方的大白菜便乖乖地躲进地窖；腊菜亦徒有其名，腊月没到，早就躺在腌菜坛里睡大觉；有一种蔬菜号称雪里蕻，却是见雪跑得比谁都快。唯有江淮间的黄心乌，非但不畏严寒，还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一朵里黄外绿的鲜花，悠然自得地开在雪野里，不为装点江山，单是让千家万户的餐桌不失风采。1948那年我七岁，岁末“三九”天有一场雪，到镇上赶集买菜的人，寥寥无几，母亲叫我陪大妈去自家菜园挑菜。大妈是小脚，平常行走，亦如风吹杨柳，在雪地走动显系勉为其难，但我搀扶，大妈还是很开心。我用手把浮雪扒开，大妈不一会就铲了一篮子黄心乌，还顺便拔了一大把小葱与大蒜。中午大伯留吃饭，饭桌上盘一盘菜烧豆腐，一盆蹄膀汤熬白菜，显然，黄心乌当仁不让地成了这一餐的主角。菜没上齐，大伯先递过来一张毛边纸，上面用抄经体小楷录了一首诗：

拔雪挑来踏地菘，
味如蜜藕更肥醲。
朱门肉食无风味，
只作寻常菜把供。

正文下面另有两行小字：范石湖《四时田园杂兴》之一

菘：白菜；醲：味道醇厚

我接过那张毛边纸，浏览一遍，心想大伯这是要考考我了，便谦恭地等着大伯开口。大伯问：懂吧？我点点头。大伯说：踏地菘就是黄心乌。哎呀，一千年前范成大就知道今天有场雪，也知道今天有人到菜园挑白菜，此诗或许他老大人为我们事先写好的吧。好了，趁热先吃菜再上饭，让这个“醲”字，从纸上走进我们的嘴上吧。说实话，那天那一桌菜的味道，当然没得说的，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心里反而觉得，是诗的味道不寻常。自此晓得：每年冬天的当家蔬菜黄心乌，竟然还有个古香古色的名字：踏地菘。从大伯家回去后，赶紧告诉母亲，她却波澜不惊地说：六安城里人喊它乌塌菜，乡下人都叫它黄心乌。黄心乌的菜梗子短，长不高，像是塌在地上，这个“塌”字，实在，而那位诗人的“踏”字，是什么意思？让人踏上一脚，才长不高的么！

没想到不识字的母亲，对也会咬文嚼字！作为家庭主妇，母亲的生活几乎与诗绝缘，却对此诗有这样的别解，真的让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往后，读了些《植物学》之类的书，才知道黄心乌为白菜的一个变种，属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在变种过程中，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属性。若与其原种白菜作比较，其一，黄心乌粗纤维少，含糖量高，口感佳；其二，耐寒力强，白茫茫大地，万物萧索，却因了如花似玉的黄心乌的存在，为单调的雪景平添一道风景线。好看，好吃，从踏地菘到黄心乌，一以贯之。